

序

《从协调走向对立：美苏对华政策研究，1945—1949》原是青年学者茹莹的博士论文。当时答辩的情景，答辩委员们的肯定、质疑和希望，我还能清晰地记起。经过这几年的思考与积累，多次的修改与提炼，她终于在紧张教学之余，将论文提升为专著。在公开出版之前，我又一次通读了书稿，欣喜地感到，这比当时的答辩论文又有了新的提高。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部以严肃和科学态度写成的具有学术价值与现实启迪意义的专著。

本书涉及的时间，1945年到1949年，对世界对中国都是一个重大转折时期。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历时300年的欧洲优势的终结和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开始。美苏两国关系从战时的合作走向了“冷战”和全方位的对抗。这时的中国，则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与卓越贡献，理所当然地要彻底洗刷历史的耻辱，根本改变1840年以来积贫积弱的地位，争取独立、民主、富强的光明未来。然而，在大国眼里，中国仍然是它们争夺的对象和讨价还价的筹码，中国自身的独立主权却变得无足轻重。特别是美国，自恃其在二战期间膨胀起来的实力，企图称霸全球，而大肆推行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民主独立的革命运动。为了独霸中国的市场，美国当局推行了一条扶蒋反共的反动路线。至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由于其在二战中的巨大损失，在战后初期推行了一条以避

战自保为特征的“安全带”政策。这一政策自然与美国的政策有着质的区别。然而，老沙皇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影响和传统以及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轻视和不信任，也使它在战后初期执行了一条支持蒋介石的路线。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苏“冷战”的加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独立自主的英勇斗争，才使它逐渐转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并给予了中国人民一定的正义的支持。茹莹同志的专著正是围绕美苏自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对华政策的演变这一轴心而展开的，其中像雅尔塔会议前后的美苏对华战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美苏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明争暗斗以及美苏由共同支持蒋介石到最后走向公开对立，都在论述之列。这样，就既忠实于历史事实，又抓住这段历史美苏对华政策中几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加以阐述，从而生动而深刻地再现了这段历史。这种从历史事件产生与发展的具体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反映了作者对于作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把握。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乃是作者对详细占有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的重视。恩格斯早就说过，科学研究不能“从纯粹思维出发”而“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41页）。茹莹同志遵循这一原则，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查阅中英文外交文件、领导人回忆录以及各类研究著作，力求使每一论断都建立在丰富材料的基础之上，而力戒空论。这对一位青年学者来说，是值得称道的。

当然，对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特别是论述美苏中三国四方互动的历史过程，光有资料而没有相当的分析能力就不可能穿透表面现象，捕捉到历史的本质和主流。这里，历史的眼光和见识力显得特别重要。对于茹莹这样一位青年学者，这方面的提高固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已可以从她的论述中高兴地看到，她正

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了避免就事论事对历史作肤浅的平面的论述，作者特设专章考察了“美苏对华政策的历史特征”；为了避免简单化的结论，她处处注意将问题放到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考察。书中既谈了美国在中国的狂妄企图，又以史实证明美国力量的有限性；既谈了苏联不肯放弃其传统的在华利益，又肯定了在中国革命接近胜利时，苏共“已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无论对苏联本身的安全还是对整个世界革命都具有伟大的意义”。这种辩证的分析是足以令人信服的。

我国近代思想家龚自珍曾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每一部历史专著的价值都在于它具有某种借鉴意义。茹莹同志在著作的开头和结尾处都有所提及。尽管时过境迁，本书内容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然而，细想起来，实在有一种思绪萦绕在我们心头，那就是，到底如何看待中国人民的力量，到底如何看待中国的未来。既然当年有着美国的支持，有着800万军队的国民党当局都成了中国人民的手下败将，今天美国当局中某些人不思以史为鉴，偏要明里暗里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其结局难道会比当年更好？既然当年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解放的大目标，紧紧依靠人民的支持而获得胜利，今天也就一定能够顶着破坏干扰势力的压力，把国家引向更加光辉的未来。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业归根到底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这也许就是我们从上述那段历史中得到的一条重要启示。

张宏毅

2002年2月

目 录

序.....	张宏毅(1)
前 言.....	(1)
第一章 美苏对华政策的历史特征.....	(9)
第二章 雅尔塔会议前的美苏远东战略与 共同支蒋政策的酝酿	(31)
第三章 共同支蒋政策的确立:从《雅尔塔秘密协定》 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57)
第四章 冲突的暗流:东北问题	(89)
第五章 美苏共同支蒋政策的终结.....	(117)
第六章 走向对立.....	(152)
结束语.....	(188)
参考文献.....	(191)
索引.....	(204)
后 记.....	(210)

前 言

1945年至1949年,对于整个世界,尤其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还未完全消散,美苏冷战便已拉开了序幕,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与对抗。正是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性因素,各种政治力量纷纷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进行重新组合,最终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国际格局。正是在这一激烈变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之后,终于迎来了全国性的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国从此诞生了。同样是在这一时期,美苏这两个中国的战时盟国,一个成为新中国的敌人,一个成为新中国的朋友。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在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历史性转折中,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关键时期,美苏对华政策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它们各自对当时的中国革命以及战后的远东格局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导致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又是什么?

这正是本选题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了解这一时期的美苏对华政策,不仅可以使人们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性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轨迹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我们把握今天的美俄对华政策,也是很有意义的。

关于1945年至1949年美苏对华政策研究,有着相当丰富的

资料。其中美国方面的资料尤为可观。美国外交文件、领导人回忆录以及大量的研究著作,都为该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过去,苏联方面的资料相对较少,加上档案保密制度的限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环节。90年代后,大量前苏联档案的解密,使得这一状况明显改善。虽然关于苏共与中共之间关系的资料依然不够丰富,但像1946年9月27日苏驻美大使诺维科夫的电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报告、斯大林1949年1月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报、刘少奇1949年6月底访问莫斯科的部分会谈记录等档案的开放,均为研究苏联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的对华政策取向提供了比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此外,中国方面近年来一些领导人年谱、回忆录的出版,及部分档案资料的公布,也有助于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尽管一般研究者还不能接触中国方面关于这一时期中苏两党关系的档案,但笔者从少数业已接触上述档案的专家那里了解并证实了部分资料的可靠性,如苏联在1946年春在东北地区以撤军方式援助中共的情况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料不足的缺憾。

国内外有关这一时期美苏中关系研究的著述颇丰,根据研究的角度不同,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以研究美苏关系或亚洲冷战为中心,将中国问题作为其中一个方面进行考察的。例如,入江昭所著《亚洲的冷战:一个历史的介绍》(Akira Iriye,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马克·伽里可所著《亚洲冷战的开始:美国东亚政策与日本帝国的衰落》(Marc S. Gallicchio, *The Cold War Begins in Asia: American East Asian Policy and the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迈克尔·谢勒所著《美国占领日本:亚洲冷战的起源》(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沃尔特·拉菲伯所著《美

国、俄国与冷战,1945—1980》(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80);拉塞尔·布海特所著《苏美在亚洲的关系,1945—1954》(Russell D. Buhite, Soviet — 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1954),等等。

(2)以研究美中关系或美国对华政策为中心,并考虑到苏联因素影响的。如多萝西·博格与沃尔多·海因里希编著《未定之秋:中美关系 1947—1950》(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ed., Uncertain Years,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欧内斯特·梅所著《杜鲁门政府与中国,1945—1949》(Ernest R. Ma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南希·塔克所著《尘埃中的模式》(Nancy Bernkopf Tucker, Patterns in the Dust)。中国学者也在这方面作了出色的系统的研究,如资中筠所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陶文钊所著《中美关系史,1911—1950》,牛军所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时殷弘所著《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等。

(3)从中苏关系以及苏联对华政策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并考虑到美国因素的。如马科斯·比洛夫所著《苏联在远东的政策,1945—1951》(Max Beloff,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5—1951);查尔斯·麦克莱恩所著《苏联政策与共产主义者,1931—1946》(Charles B. McLane, Soviet Policy and the Communists, 1931—1946);奥莱格·鲍里索维奇·鲍里索夫所著《苏中关系,1945—1970》(Oleg Borisovich Borisov, Soviet — Chinese Relations, 1945—1970);谢·冈察洛夫、约翰·莱维斯、薛礼泰所著《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列多夫斯基所著《斯大林与中

国》，等。

(4)以某一阶段的美苏中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如奥德·怀斯塔德所著《冷战与革命：苏美对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4—1946》(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 — 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注重对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此外，还有张少书著《朋友和敌人，美国、中国和苏联，1948—1972》(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对美苏中三国关系的变动作了深入的探讨。

(5)从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角度，研究美苏对华政策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如雷阿登—安德森所著《延安与列强：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之缘起，1944—1946》(James 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1946)。中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牛军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杨奎松著《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等。他们根据鲜为人知的中共外交档案史料，通过深入系统的分析中共政策的演变，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苏对华政策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影响。

可以看出，关于美苏中关系的研究现已颇具规模。然而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学者们多数是从美国对华政策或苏联对华政策的角度入手的，而缺乏对这一时期美苏对华政策发展脉络的总体性分析。仅仅把美国当作苏联对华政策或者把苏联当作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因素来考虑是不够的。作为战后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从二战结束前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期，它们分别根据自身利益确立

了本国的对华政策,但在两国的对华政策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同样受制于战后国际关系发展变化以及中国局势的影响,而且,在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影响下,对于彼此关系的考虑,一直是美苏制订各自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换句话说,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与战后国际局势以及两国关系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因而,从战后国际局势变化的大背景出发,就美苏两国对华政策作一深入、系统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一研究,将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光辉而独特的道路。

本书正是围绕着这一时期美苏对华政策的演变而展开的。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第一章:美苏对华政策的历史特征

本章对历史上的美苏(俄)对华政策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并总结了各自的特征。就美国来说,在1945年以前,美国对华政策具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侧重于经济扩张,以经济扩张带动政治扩张,二是始终站在中国革命的对立面。与美国相比,作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的沙皇俄国,其对华政策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它更注重对中国的领土扩张与控制,以领土扩张带动政治扩张与经济扩张。受其影响,苏联对华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表现出了注重对中国东北、外蒙、新疆等地区的控制的特点。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苏联则表现出了既有积极的支持,又更多地是以其自身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矛盾性与复杂性。1945年之前美苏对华政策的上述基本历史特征,在1945年之后的美苏对华政策中一再地得到了反映。

第二章:雅尔塔会议前的美苏远东战略与共同支蒋政策的酝酿

战争改变了国际格局,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时,美苏根

据各自的利益需要，确立了它们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并针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制订了各自的对华政策。出于对中国国内政治局面的分裂既不利于对日战争的顺利进行、也不利于两国战后远东战略的实现这样一种共同的判断，到1945年初，美苏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了共识：一是两国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主张以政治民主方式解决国共冲突，团结各派力量共同抗日，并最终实现中国的统一；二是苏联承认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主导地位，美国表示理解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所拥有的特殊利益。美苏共同支蒋政策已初见端倪。

第三章：共同支蒋政策的确立：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美苏划分了两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在此基础上，双方就中国问题进一步达成协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一步以国际法的形式将美苏英在雅尔塔会议上秘密达成的关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确立了下来，从而将美国、苏联与中国紧紧地联在了一起。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表明美苏最终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了它们在远东利益的划分，并最终确立了共同支持蒋介石的对华政策。然而，从一开始，这一政策就包含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从而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一点，在战后不久的美苏对华政策中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第四章：冲突的暗流：东北问题

随着战争的结束，共同敌人的消失，美苏之间的对抗逐渐代替了合作。美苏共同支蒋政策也因此面临种种危机，尤其在东北问题上，到1945年11月，事实上形成了以美国公开支持蒋介石为一方、以苏联暗中支持中共为另一方的新局面。美苏共同支持蒋介石政策开始受到挑战。苏联对华政策的这一调整，为中共进军东北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客观上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但是，苏联对于中共的支持，更多地是基于其对华政策的策略性调整。

第五章：美苏共同支蒋政策的终结

面对中国局势的日益恶化，美苏都不愿在中国问题上爆发战争，因而分别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苏双方再次达成妥协，继续共同支持蒋介石的政策。美国派出马歇尔赴华调停国共矛盾，苏联则转而表示配合国民党军队进军东北的行动，并限制中共在该地区的发展。然而，随着美苏对抗在 1946 年初的不断加剧、美蒋日益成为同盟的情况下，继续支持蒋介石已与苏联的自身利益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苏军撤出东北为标志，美苏共同支持蒋介石政策再次破产，并最后走向终结。

第六章：走向对立

中国内战全面爆发后，美国在支蒋反共的道路上越来越难以自拔，敌视中共越来越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内容。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拒绝给予承认，并开始了与新中国长达 20 余年的敌对关系。与此同时，苏联的对华政策却呈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苏联也给予中共以越来越多的支持，直到公开承认新中国。美苏对华政策则由此走上了公开的对立。

结束语

1945 到 1949 年美苏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也就是美苏共同支蒋政策从确立到瓦解的过程。在美苏冷战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这一演变轨迹的出现是必然的。同时，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也极大推动了美苏对华政策的演变。从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美苏对华政策既有斗争性，又有妥协性，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以独立自主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这一历史经验对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美苏对华政策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本书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个时段、一个角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我深知自己的学力有限,文中肯定还存在着很多缺陷,敬请方家指正。

第一章

美苏对华政策的历史特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讲都是由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因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统治阶级利益的不同,加上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不同等因素,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传统的影响,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连续与变化的统一。而从一定意义上说,了解那些传统的、具有连续性的因素,对于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因此,要研究 1945 年至 1949 年的美苏对华政策,首先应该对 1945 年之前美苏对华政策的基本特征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作为英国商业资本扩张的产物,美利坚合众国从 1776 年诞生之日起,便继承了英国的商业精神和扩张意识。在不到 200 年的时间内,美国从最初的 13 个殖民地,发展为两洋国家,以至确立了在全球的霸权,可以说,扩张成为“贯穿整个美国对外政策史的主线”。一部美国史便是一部扩张的历史。

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即大陆扩张时期(1775—1898),海外扩张时期(1898—1945),和全球扩张时期(1945 年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便是在上述对外政策框架内进行的。从总体上来说,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经济扩张为主,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1784年2月22日,满载着棉花、胡椒、皮货和人参等货物的“中国皇后”号商船从纽约启程,经历了6个多月的航行,于8月28日抵达广州。“中国皇后”号的来华,标志着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开始。当时的中国,正值乾隆盛世的末期,封建统治者以“天朝”自居,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而美国虽然是一个独立不久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还都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但其商业资本的扩张本性已充分显现出来。正是在经济扩张内在动力的驱使之下,中美之间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关系往来。然而,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还更多地限于商业的和民间交往的层次,真正近代意义上的中美外交关系,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建立起来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被纳入了一个由西方强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社会之中。美国也趁机扩张其在华势力。1842年英国迫使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美国政府乘机对清政府进行讹诈,逼迫清政府于1844年签订了《望厦条约》。通过这一不平等条约,美国获得了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协定关税以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1856年10月,英法侵略者发动了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又趁机从中渔利,利用清政府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于1858年6月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进一步掠夺中国的权益。

不过,当时美国正忙于进行大陆扩张,其外交政策的目标,首先在于扩大和巩固其对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中国问题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就实力而言,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美国的力量都还相对弱小,难以与英法等老牌的西方列强相比。不仅如此,19世纪中期的美国还面临着严峻的内部分裂形势,因南北方在奴隶制等问题上矛盾的尖锐化,南部各州要求脱离联

邦的呼声日涨。1861年南北内战的爆发以及战后开始的南部重建,使美国更加无暇过多地插手中国问题。因而美国政府选择了追随英国的政策,以获取在华利益。在他们看来,“美国只需跟在英国外交官和炮舰的后面,要求享受他们向北京勒索到的特权,只要英国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而中国默认这个宽容的政策,美国就能在形式上维持与中国和睦的同时,获得炮舰外交带来的好处”^①。

然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便彻底改变了追随英国的小伙伴形象,开始奉行独立的、积极的对华扩张政策。经过近一世纪的大陆扩张,此时的美国已从大西洋沿岸的13个殖民地发展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两洋国家,为其向太平洋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尤其是在南北战争以后,美国扫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经济进入了迅猛发展时期。到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已跃居世界首位。随着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它越来越需要开辟广阔的海外市场,其对外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已经具备相当实力的新兴强国,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向亚太地区发展、建立一个太平洋商业帝国成为美国新的扩张目标。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是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第一场战争,标志着美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标志着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时期。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菲律宾,加上同年吞并的夏威夷,从而获得了向中国扩张的重要跳板。就在美国极欲染指亚太地区之时,中国的局面却出现了剧烈的动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在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并于1895年4月被迫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甲午之战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腐败,列强纷纷趁机向中

^① [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8页。

国扩张,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6年6月,俄国通过与中国签订《中俄密约》,加强了它对中国东北的控制。1897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并于次年3月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将中国山东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1898年3月,俄国又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获取了中国的大量权益;与此同时,法国在广东、云南和广西三省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而早已将整个长江流域视为其独占势力范围的英国,不仅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而且又租借了威海卫和新界。列强在中国的扩张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场”,它为美国商业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简直是无法估量的”^①。面对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美国国内一些人开始担心本国在华利益会因此受到冲击,因而要求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当时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亨利·卡伯特·洛奇便提出:“整个欧洲都在中国扩张,如果我们不在东方建立起自己的地位的话,那么这个唯一可以给我们的未来带来财富以及有希望找到对我们至关重要的新市场的广大地区,实际上将永远对我们关闭。”^②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在研究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时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的美国,“人们普遍地认为不能坐视亚洲事态的发展,相反,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中,一再宣扬华盛顿政府应参与亚洲事务,保护美国利益,成为亚洲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角色”^③。这一切都促使美国采取更富扩张性的对华政策。

然而与其它西方列强相比,美国更强调在对华政策中采取经

① [美]坎贝尔:《特殊的商业利益与门户开放政策》(C. Campbell, 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纽黑文,1951年版,第11—12页。

② 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第187页。译文根据英文校改。

③ [美]入江昭:《亚洲的冷战:一个历史的介绍》(Akira Iriye,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新泽西,1974年版,第31页。

济扩张而非领土扩张的方式。一方面,这是因为在当时美国虽是一经济强国,但就军事力量而言,它却并不具备与老牌西方列强进行在华竞争的强大实力,更何况美西战争牵涉了美国的大部分精力,双方为争夺菲律宾、古巴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另一方面,美国相信,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它完全可以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韩德在《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一书中指出,“美国农场和工厂的产品是如此优良,只要盛行自由贸易,美国不仅确信在中国能象在别的市场一样获利,而且不需要华盛顿坚持自己的权利,也可以有可靠的长期影响”^①。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中期,美国国务卿西沃德就已认识到,商业是美国人“最伟大的事业之一”,是“发展文明与扩展帝国的主要力量”。他断言,军事征服、土地兼并对于美国来讲并不是扩张的最佳手段,美国所追求的,应是通过商业扩张,建立“门户开放”式的商业帝国^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899年9月至12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训令驻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国大使向驻在国提交了一份照会,正式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各国对他国在中国的任何“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投资事业或其他既得利益,不得干涉;

(2)各国对运往自己“势力范围”内各口岸的他国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中国现行关税税率收税;

(3)各国对于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在其“势力范围”内所建筑、控制或经营的铁

^① 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第190页。

^② [美]欧内斯特·N. 鲍里诺:《美国帝国的形成:威廉·西沃德与美国对外政策》(Ernest N. Paolino,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Empire; William H. Sewar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26—28页。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